· 人文新探 ·

中国女医研究进展及启示

黄天骄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随着医学史研究议题的不断丰富, 作为历史“边缘”人物的女医群体也逐渐受到学者重视。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成果, 发现学界对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各有偏重。古代女医一方面被社会史或性别史学者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史中, 展现其医学经验来源的社会因素、医事制度、与正统医学的博弈以及与病患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女医杂言》等医学著作被中医界学者留意, 其所探讨的医学知识、方药理论, 大体上不脱离中医学学术史的范畴。而近代女医研究则集中在公民意识觉醒、女权运动、西学东渐等历史背景下的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媒介、家庭与职业关系等方面。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的研究成果因时期的封闭性鲜有融通之作, 女医现代化转型、近代女医医学思想等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并应注重性别理论的借鉴与史料多样性的开拓。

关键词: 女医; 医学人物; 性别史; 医疗史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1.009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1-0075-11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Researches on Chinese Female Doctors

HUANG Tianjia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nriching research issues for medical history, the female doctors, once deemed as marginal figures in history, have obt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y scholars. In recent decad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ancient and modern female doctors have shown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spects i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one hand, ancient female doctors were placed in a broader social life history by scholars of social history/gender history, to reveal the source of their medical experience in terms of social factors, the medical system, their competition with orthodox do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patients; on the other hand, female doctors' works such as "Women Doctors' Medical Notes" have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And the discu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escription theory in those works generally li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hile, the research topics involving female doctors in modern times focus on aspects such as women's medical education, medical policies, media, marriage and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wakening of civic consciousness,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作者简介] 黄天骄 (ORCID: 0000-0002-9339-1850), 博士生, E-mail: 596667427@qq.com

productive research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female doctors, due to the closed nature of the period limit, few works have incorporated both domai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female doctor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roles and the medical thoughts of modern female doctors, with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reference of gender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data diversity.

【 Keywords 】 Female Doctors; Medical Figures; Gender History; Medical History

本文所论“女医”，是指医疗从业人员中的女性群体，包含掌握传统医学知识、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诊疗的女医者、专事收生的稳婆，以及近代以来接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女医师和新式助产士等^①。1929年，季寅的一篇短文《女医志》刊载于《中医世界》，列举了7位我国古代的著名女医：汉有义媼、淳于衍，唐有蔡寻真、李腾空、杨保宗，清有冯衢女、朱懿安，“今则医校中如中医专校、中医学院等均收女生，他日女医人才之盛未可量也”^①。1931年，秦伯未发表同名文章，对上述女医的史籍资料予以补充^②。1934年，《光华医药杂志》推出“女医专号”，刊登了多篇由女性医者撰写的评论^③，其后“零缣寸锦”栏目刊载女医裘吟五的《纪革命先烈秋瑾提倡女医事》一文，引述秋瑾：“女子不仅应与男子同操干戈，展国贼兴民族，更尝知医学，平时济世，战时充救护。曾亲译看护学教程，按期在女报发表，并力劝中学女生学医，俾将来服务社会，以尽‘匹夫’之义。”同在“女医专号”上，谢瑜又对女医史的撰写提出了希冀：“近代女医已渐多，希望我女医界有人能撰一中国女医史为国医学界增光。”^④

应该说，在现代学术界关注到女医之前，民国期刊报纸上已出现了一些讨论，这些零星的探讨是为近现代女医研究之肇始。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史、社会史、妇女/性别史的蓬勃发展，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女医、女性医疗的学术阵地不断探索。一方面，出于对传统医学文献的挖掘和利用，医史学者陆续将《女医杂言》《古欢室集》等女医著述加以整理、研究，继而探讨女医制度、女医成长模式等医学问题；另一方面，女性行医问题与医者群体、医事制度、妇女医疗、女权运动等诸多议题交融，渐为社会医疗史和性别史学者所关注。女医历史的研究虽未形成医学史、性别史研究的主流，但亦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在选题、视角、理论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⑤。本文就近40年来学界关于古代与近代女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与评述，由于时段跨度较大，研究成果庞杂，无法一一列举，仅述其大要。

一、晚清及前代女中医研究

王慧芳、刘海波、贝润浦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多篇古代女医概述性文章，在史料学和文献学方面具有深化和补充意义^{⑥-⑦}。此后，有关古代女医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主要包括女医类别的划分、女医与女性医疗的关系、女医教育与行医制度、著名女医及其著述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一）女医类别的划分

李志生剖析了在正统医者体制下女医遭受边缘化的原因，并提出古代女医大致分为官府太医令属下

① 根据断代与关注问题不同，“女医”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存在区别。如探讨中国古代的女性医疗从业者，一般不会特别强调“女中医”，而近代则多将中医、西医分别讨论；另外，古代的稳婆、药婆，近代的女护士、助产士是否应归于“女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本文的处理是不将“药婆”“女护士”纳入考察范畴。

② 杨奕望的综述文章即从医学史与性别史切入，介绍了近代以来关于古代女医由来及其稀缺原因、群体演变与个体研究、女医的性别意义等四个方面的学术成果。参见杨奕望、钟薇：《中国古代女医研究回顾、平议与展望》，《思想与文化》，2019年第2期，第376-387页。

的女医、女儒医、士人家族女医、下层女医及其他妇女健康护理者四类^[8]，这一分类普遍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钟薇注意到一些身份特别的方外女医群体未被充分发掘，提出将擅长医术的女道徒纳入“女医”群体^①。万四妹则着眼于地域特征，将明清时期新安女医分为一般医疗服务者、助产服务者、夫业助手、夫亡继承医业者四类^[9]。可以发现，论者对古代女医的划分考虑到行医动机、医学知识来源、身份归属等诸多因素，并无统一标准，这种情况也侧面反映出女医群体的复杂性。

（二）女医与女性医疗

在“男女有别”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患者在遭遇妇产科疾患时更倾向于寻求女医的帮助，因此对女医的考察也成为女性/性别医疗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近年来，自汉代至明清女性医疗从业者的足迹已被李贞德、费侠莉、梁其姿、衣若兰逐步勾勒出一脉相承的图像^[10-12]。在20世纪90年代，李贞德已关注到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从业者，指出女医为人治病最大宗者是与孕育相关之病变，用药知识的来源较隐晦，大体与生活经验与家学背景有关。女性虽有行医的自由，但也因其身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被排除在正统医学之外。随后，她又将研究扩展到从性别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的医疗文化，于2008年出版了《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此书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女性医疗史的视角：尽管大多数女性的身体经验并不能保证其成为医者，但家庭场域中的医疗之职却因性别分工而更多落在她们身上，使其兼有被照护者和医学经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1999年，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一书在美国出版^②，本书融合了性别、医疗、身体等多种观察视角，在考察宋代妇女分娩医疗时提及稳婆的作用，又专辟一章探讨“作为治疗专家的明朝妇女”，明代产婆与名医谈允贤不同的教育经历与行医生涯，揭示出性别和阶层关系在女医中的复杂性。

在女医群体中，稳婆一方面作为助产者，其来源更广泛，服务更专门；另一方面社会对她们的需求相较于虔婆、牙婆等更高，是三姑六婆人群中职业化、专业化最强的一类^③。但专事收生的稳婆与接受正统医学教育的女医地位具有明显差别。梁其姿考察了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研究表明，12世纪之前，大众对助产妇与女医没有特别的憎恶，12世纪之后，理学兴起与正统医学的稳固增强了公众对女性行医的不信任感，但在民间社会对她们的需求有增无减。有素养的、遵循正统医道的女医，产生在理学发展晚期，主要在仕族中。到帝国末期至近代，正统女医楷模的普及化迅速实现，对晚近医疗史转变或有一定贡献^[13]。

（三）女医教育与行医制度

女医医事制度与教育成长模式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楼劲认为唐令女医条中的“官户婢”应作“官户、婢”，女医从官户、官婢两类人中选取^[14]。女医所学科目只是医疗分科中的一小部分，反映其在医疗活动中的附属地位。文章结合敦煌莫高窟壁画，分析女医之制或始于北周，隋定《医疾令》在唐初以

① 钟薇《中国古代女医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该文考察了1840年以前参与医疗实践的女性，涵盖了正统女医及具有一定医疗技艺的姑婆群体以及通晓医理的女性宗教实践者。文章着重探讨古代女医的由来及其稀缺的原因；古代女医群体的演变；古代女医个案研究与性别意义。女医涉及的时代从汉到明，跨度较大，但文章篇幅较短，故只对古代女医史料进行简要梳理与分析。

② 该书最初介绍到国内时，译为《蕃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参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8-168页。Flouring Yin取自明代医家万全《济阴纲目》中的“济阴”二字。

③ 古代稳婆的研究主要有：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社会的探索》，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第33-87页；张璐：《近世稳婆群体的形象建构与社会文化变迁》，南开大学，2013年；林保淳：《三姑六婆 妒妇 佳人——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新北：暖暖书屋文化，2013年；李埏，李伯重，李伯杰：《走出书斋的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来有所调整,宋仁宗时摒除。徐艳芹考察唐代女医群体,认为她们的产生和存在解决了儒家男女有别观念造成的身体隔离,女医教育有官方机构与民间师传等途径^[15];董丽娟从《清代女科学家》(沈雨梧)和《女医志》(秦伯未)二书中筛选出28位女性医者,分析其生长环境、教育经历^[16];徐建云认为古代社会女医稀少主要有四个原因:女子受教育机会少、重男轻女的习俗造成传男不传女的知识障碍、医生职业特点使然、女子从医具有偶然性^[17];林亭秀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鲍姑、谈允贤的教育经历和成才模式^[18];张继的研究表明,从秦汉至清代,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女医制度,此后受西方医学规范化影响的医者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医。古代女医在不同时期、不同医政文化制度下经历了一段为人忽视的兴衰历程。概括而言,秦汉魏晋时期,女医初露锋芒,宋代医政重儒、重理,致使女医发展边缘化,金元医学地位的彰显与女医步入低谷形成鲜明对照^[19];沙蕾剖析了女医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关联^[20]。王丽认为古代女医的教育途径有政府相关机构、家庭、自学等,虽数量稀少却具有男性医者不具备的优势^[21]。不过,以古代女医史料较少而得出女医稀缺的结论似乎值得商榷。首先,有条件撰写医书并流传后世的医家,无论男性或女性,在整个医者群体中都是少数,而没有著述留存的医生们在民间仍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其次,大部分女医资料都由男性来书写,性别、权力的差异使其对女医的记录并未做到客观全面。

(四) 著名女医及其著述的个案研究

现存史料中,《史记》最早记载了女性妇产科医生。张秀传利用《史记》材料,考证了西汉宣帝时女医淳于衍、义妫生平^[22]。杨顺益探讨晋代针灸女医鲍姑与鲍姑艾^[23];盖建民介绍了唐代女道医胡愔及其道教思想^[24]。明代谈允贤医案一直是女医研究的热点。2016年,汪剑出版了《谈允贤〈女医杂言〉评按译释》一书,分析解读谈氏医案^[25],而早在1999年,郑金生已对谈允贤医案、生平和行医经历做出介绍^[26],沙蕾、王晓绚、罗思航等均对《女医杂言》的医学内容从不同角度做了探索^[27-29];张易从认为谈允贤在学术上继承朱丹溪、李东垣,从气血出发治疗脾胃病,《女医杂言》收录的31则医案中有脾胃病10例,以滋阴养血、健脾补气为要,实践中常采用灸疗与内服药物并用的方法^[30];王超群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谈允贤的职业生涯^[31]。

清代女医中,受到学者关注的有曾懿和顾德华。王林云简要介绍了曾懿《古欢室医书三种》的文献特点^[32];林振坤认为吴中女医顾德华师承韦君绣,医著有《花韵楼医案》《调治伤寒论》(佚),她不曾像曾懿那样讨论男女平权、提倡女性教育,带有“现代性”色彩,她与谈允贤相类,属于更纯粹的传统女中医^[33]。高世瑜指出,史料鉴别问题已经成为妇女史研究的瓶颈^[34]。大多数女性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翔实的属于自己的文献资料,有限的资料或受时代所限或带有记录者的个人情感和特殊目的,需要仔细甄别。胡适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中就谈到,仅有少数人的作品能够凸显出其独特的价值。“诗词之外,算学只有江绶芬《算草》,以及王贞仪《算术简存》等五部;医学只有曾懿《古欢室医学篇》一部。”^[35]可以发现,晚清女医曾懿与传统女医已有所区别,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台湾国立中兴大学的叶雅婷在其学位论文《晚清曾懿(1853—1927)〈古欢室集〉的身体经验与论述》中,透过曾懿的人生/身体经验,探讨了一名晚清妇女如何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新知交会的世代里,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思想及行为,以顺应社会趋势的过程。曾懿具有多重身份,她是诗人、医生、女学家,同时也是才女、妻子、闺塾师,她积极学习医术用以自救或救人的意识,以及她在知天命转向后撰写对社会有益的著作,使得她的人生开拓出与一般中国传统才女不同的面貌。杨彬彬利用“疾病的隐喻”这一概念,通过对曾懿作为晚清女诗人、女医家、维新思想者和女性教育倡导者的多重身份进行详细剖析,考察晚清中国疾病隐喻的变化如何导致女性与疾病等概念重新形成,并进而导致女性的才女身份发生改变^[36]。以中医语言吸纳西医思想,由传统才女向维新思想者过渡的过程,是新女性出现的前奏。

二、近代女医研究

1897年,梁启超发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标准,反对缠足,提倡女学^[37]。1907年,《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平论》,但只设女子小学、女子初级师范两种学校,不许进入中学及大学。1897年,李闰、黄瑾娉创办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女学会”和最早的妇女报纸《女学报》,喊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口号,提出女子参政的要求。1900年,《清议报》发表了日本人石川半山的《论女权之渐盛》一文,首次介绍西方女权之来源及女子争取参政权、经济权的重要性。20世纪初年,中国妇女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女国民”的提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此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38]马君武于1902年翻译出版斯宾塞的《女权篇》,次年翻译出版了约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此外,一些报刊也连载了《泰西妇女近世史》《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贞德传》《世界十二女杰》《东欧女豪杰》等文章。红十字会创始人南丁格尔的事迹也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女性及有志于妇女解放事业的男性带来了新的世界。在近代医疗史中,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医走入中国医疗场域,洋医、西医、护士的出现,使得医者角色逐渐多元,至于以性别作为职业特色的女医,包含女中医与女西医,两者在早期研究中为学者分别讨论,其中女西医又因史料较多,较早受到学界注意。近年来,学者开始将女中医、女西医一同讨论^[39-40]。

(一) 身份认同

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走出闺门开始职业生涯的必要条件。陈永森在探讨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时指出“女人也是公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康有为第一次提出“女公民”概念^[41]。《大同书》“国者合人民以为国,人民者无间于男女者也”,“将欲为太平盛世欤,以女子为公民,太平之第一义也”。梁其姿《民族尊严、男女平等、还是无私救济——首批中国女医生的选择》则讨论了世纪之交的女医。包含首批受传教士资助出国者、首批本土训练女医,以及同时代的传统女中医。何小莲在《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一书中探讨了女医的职业地位、形象、收入与生活状态,指出女医较多单身、晚婚或拥有短暂婚史。

蔡博方透过《申报》揭示了报刊现代性与公民身份。在社会科学对于报刊与新闻的研究之中,可以发现一个潜藏主要论题:现代性(modernity),由臣民到公民的变化^[42]。《申报》在晚清、民初、20世纪20至30年代三个时期分别呈现出旁观者公民、贡献者公民和知识者公民三种意象。作为发行时间长、销售量高的报刊,《申报》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清末民初的妇女教育与女权运动让“女性”身份相当程度上与“国民”论述产生了关联。受教育、参与政治、关心公共事务已不再限于男国民,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原有的性别角色,扮演了“国民之母”“国民之妻”的角色。

民国时期,海派中医对全国的医药事业具有引领作用,其中上海的女中医也在探索和崛起之中。中医李平书与女西医张竹君共同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办学宗旨是“贯通中西各科医学而专重女科,使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通恻而达病情”,《中国女医》杂志的创办和中国女医学社的建立展现了女医们在中医危急时刻的团结和努力^[43]。杨彬彬的学位论文考察近代上海女中医(1925—1949),将女医学校的出现、招生、女性行医资格的获取、就业环境等问题一并讨论,最后以上海中医学院末代女学生夏霁春为例,说明1940年代女中医界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以个人所学随时面对时局的变化^[44]。徐斯林则着眼于民国时期上海的女西医,国内教育与出国留学使她们掌握了现代化知识,在行医与其他社会活动中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与社会形象,与此同时,由性别带来的困惑始终存在。

与近代以前注重女医个案不同,晚清以来的女医研究多侧重群体,但也有个别女医因其著述流传受

到学者注意。如黄子天介绍了被称为岭南鲍姑的清末民初揭阳女医孙西台，她是1949年以前岭南地区有详细临床诊疗记录传世的唯一女中医，文章分析了孙氏医著《昼星楼医案》在内科、妇科、儿科方面的学术观点与临证经验。医案共93则，载方14首，另有2则介绍西方及日本卫生学的医话^[45]。此外，美国学者施康妮从性别、种族和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早期外出习医的康成与石美玉的教育经历及其回国后的行医生涯^[46]。这个带有深描性质的研究还关注康成和石美玉如何融合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改良派的思想体系，并把它们呈现于更广阔的文化借用的语境之中，挑战那些把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描绘。该研究也探讨了向中国引进西方医学这一复杂而备受争议的过程，以理解西方生物医学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如何适应和变化，尤其是在参与创建女性护理职业的过程中。相比她们医疗事业的延续，康成和石美玉更重要的遗产还在于她们使得西医职业生涯对许多年轻的中国女医而言成为可能。

（二）《中国女医》刊物

学者也注意到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女医》系列刊物的历史价值。《中国女医》是民国时期唯一由女中医编辑出版的医药期刊和唯一面向全国女性中医读者的医药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纪征瀚考察了《中国女医》的办刊道路^{①[47]}女医创办中医药期刊的七年之路，也是女权运动在中医药界由热至冷过程的缩影，反映了女医们从懵懂到自信再到自省的过程。作为现存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本由女性主办的中医药期刊，《中国女医》的受众定位错误或许是其失败的主要因素。章原也指出，《中国女医》虽为医学刊物，同时也包含了性别与职业、女医职业与婚姻等社会性议题，为近代女性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48]。马祥对刊物的创刊背景、创刊人、编排体例、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依附于《国医砥柱月刊》的《女医专号》中关于女人为何要学医，女医能做什么的讨论诸多，到了《中国女医》则转向民族医药之未来，笔调也由谦逊转向犀利。作者总结道，最初的《光华医药杂志》的《女医专号》中的女医，热望的是女医职业的普及，她们尚不知女权运动为何便盲目接受，导致了只能空喊口号和随意解释；《国医砥柱月刊》“刊中刊”的女医，关注的是中医药的前途，她们自信可以消弭性别差异，与男医们联手战斗；独立刊行的《中国女医》中的女医，哀叹的是女医群体素质的有待提高，她们遭遇挫折后，开始对自身缺陷和命运进行反思^[49-50]。马祥的硕士论文同样以《中国女医》为研究对象^[51]，除了介绍办刊宗旨和文章学术特点外，还注意到《中国女医》的作者大多来自“上海新中国医院”，她们的成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时期女中医教育多样性的特点，师承与院校教育并存的培养模式。

（三）女医教育与行医政策

赵婧认为“女子习医论”始于19世纪末西女精医的故事与形象，随着女子行医成为“生利”而非“分利”的行为，逐渐融入女权话语，并进而在女西医张竹君身上得以实践，即使与男性相比，女西医、女中医在人数上皆处于劣势，但与其他职业相比，医生在女子习医论下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52]。赵莉考察了1879—1919年间中国的女西医，从择业的社会与个人因素、群体萌生至扩大的发展过程、职业与社会活动、地位与影响等方面揭示了她们作为社会服务者、文化传播者、妇女解放启蒙者的历史意义^[53]。王惠姬^②的研究关注到留学习医归国者，清末自1881年金雅妹留学美国以来，至1927年为止，留美实科女生至少有124位。其中攻读医科人数最多，有41人，她们为中国医护卫生的现代化作

① 1934年，《光华医药杂志》推出《女医专号》，1939年，中医世家出身的钱宝华女士带领师妹张静霞与一批中医界女性借用《国医砥柱杂志》的版面，创办《中国女医》，1941年，《中国女医》独立刊行，发行8期后于当年停刊。

② 首批在广州接受女子西医教育者可参考 Shing-ting lin “The Female Hand: The Making of Western Medicine for Women in China 1880-1920s” New York: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出了卓越的贡献。赵耸婷、韩大全认为，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推动了西医教育的发展，且最初只是针对男性的教育；清末出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兴办女子西医教育，民初女子西医教育建制化完成；女性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化发展造就了早期的女医群体，冲击了中国固有的职业观念，促进了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作用^[54]。梁其姿的论著《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救济》围绕明清至近代大变局中的两个着力点——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讲述了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谋求稳定的重要关系^[55]。刘莉莉硕士论文《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女性行医政策研究（1927—1937）》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展开的。继北洋政府之后，南京民国政府在对医疗事业的规范和发展中，也加强了对女性行医的政策管理。一方面，对旧式女性行医者的取缔与限制对女性从事西医职业的规范与培训，包括女医师、助产士、护士的塑造。《护士条例》《助产士条例》等相关法规的颁布，政府先后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助产教育委员会及护士教育委员会等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尽管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例如制定者操之过切，缺乏通盘考虑，规定之外很少有对医生权益的维护，以及在对待中医西的态度上常常厚此薄彼。另外，党内派系林立，资金不足也使许多政策的落实受到限制。虽然作者旨在深化近代医疗卫生政策及中国妇女史研究，但文章中的女医师大多是作为“登记簿”上的名字而一笔带过，对她们的行医生活缺乏微观考察。龚鸣以新闻传播的角度，利用报刊资料，从传教士进入广东社会这一变化入手，阐释女医出现的契机以及对近代广东女界在职业化及男女平权等领域的启蒙作用^[56]。

在新旧过渡之际，医学教育中关于旧式产婆的改造涉及分娩医疗化的问题，中西医竞争的态势不可避免地也介入其中。朱梅光注意旧产婆的“职业重塑”经历了从民间先导到国家主导的不同阶段，随着西医的影响不断加深，西式助产学校、培训班及产科医院等逐渐占据主导优势，成为产婆改造的主要机构，但技术改造与制度变革的过程并非毫无阻碍，实际效果也受到了质疑^[57]；赵婧的研究显示了新式助产士进入医疗领域是上海分娩卫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58]；章梅芳展现了北京产科群体的训练模式与形象建构^[59]；顾佳佳则聚焦广州助产学校的发展，揭示了在助产培训方面近代与传统中国不同的一面^[60]。

（四）女医与宗教

王庆林、夏坤考察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晚清教会医校与女医人才的培养问题^[61-62]。教会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利用医药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教会医疗事业大都经历了创办诊所、医院，进行医学教育的历程。2005年5月，“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这是国内首次以性别研究与基督教史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学者中女性占了大多数。编者在前言中指出，收入论文集的研究事实上仅是关于女基督徒的初步探索，基督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最早的妇女接受现代教育的通道。各种女校的创办，也使部分中国女子第一次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中西女信徒群体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教会在中国的宣教实践，很大比重为教育、医疗卫生和慈善事业，在这些领域中妇女尤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广州外，徐炳三探讨了1857—1949年间福州女信徒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作者认为，来华的教会西人中，既有女传教士也有男传教士的妻子。她们一方面以《万国公报》等刊物为阵地，介绍女权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开办女学来实践这种观念^[63]。福州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慈善、公益、医疗、教育等各类事业中都有大量女信徒的参与，福州各会开办的妇幼医院中基本以女性医护人员为主力。女信徒中的杰出代表许金匄，先后在卫斯理大学、费城女子医学院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于1895年归国后接诊了大量患者并培养出4名中国女医师。

三、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近几十年女医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古代女性医疗从业者一方面被社会史/性别史学者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史中,更多展现其医学经验来源的社会因素、医事制度、与正统医学的博弈以及与病患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中医学者因其医学背景,遂更留意于《女医杂言》《花韵楼医案》《古欢室集》等医学著作,探讨其中的医学知识、方药理论,尽管也会提及女医个人经历,大体上不脱离中医学术史的范畴。不过,这两种取径并非没有交集,也渐有融合的趋势,且学者们也都在其擅长的领域对女医史料不断进行拓宽和深化。近代女医的研究议题集中在公民意识觉醒、女权运动、西学东渐等历史背景下的女医教育、自办刊物、婚姻、职业环境、医疗政策、教会医学的影响等方面,研究者以历史学者居多。可以看到,在近代女医职业化的进程中,早期对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吁频频受阻,不得不以强国保种为名增强女子习医的迫切性,这种职业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母亲或妻子家庭角色的延伸。

目前,医学史研究在注重医学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多学科、多视角的融通互鉴。结合当前医学史研究趋势及现有女医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本领域还有许多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 性别理论的借鉴

事实上,在医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女医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的过程,东西方学界的性别研究也在不断发生转向。丁见民指出,美国性别医疗史研究更多揭示特殊的社会文化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史转向的范畴。在1970年代以前,学术界将目光聚焦于医生的职业化,女性医师的研究处于边缘化地位。从1970年代,关于女性行医者的历史研究已经开始改变^[64-65]。到1990年代以后,女性行医者的相关研究,不仅展现了医疗史社会文化转向的某些特征,而且揭示了当时女性的地位及其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66]。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后,社会性别史研究蓬勃发展,2001年,“唐宋妇女与历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其中“性:身体与文化”作为八个议题之一出现,既是妇女史/性别史进入主流史学的标志^[67],也从侧面反映出医疗史与思想史、经济史、宗教史等并驾齐驱的态势。但在女医研究中,对于性别理论的借鉴仍存在不足,揭示性别差异如何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形成,探讨女医知识来源与行医空间、近代女医职业化、女医的社会适应等问题时,引入社会性别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史料利用时也应辨析“女性意识”与“男性话语”的区别。

(二) 女医现代化转型研究

晚清以前,女性习医大多源于家族传承,并未出现成规模、成体系的女医教育,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知识的传播消除了男女之别,女性可以自由习医、女性患者可以自由择医。可见,晚清到民国时期是女医群体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尽管古代女医与近代女医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受历史分期所限,鲜有融通之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学者对近代女西医关注较多,对女中医着墨甚少,使得她们在女医讨论中沦为配角,但她们身上融合传统与现代,不管是在现代化或女权前进的路途中,都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要揭示女医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需要探讨医学发展、经济状况、社会秩序、文化形态、政治形态的等多种因素的延续与断裂,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

(三) 近代女医医学思想的研究

目前学者对《女医杂言》《古欢室集》《花韵楼医案》等传统女中医著述关注较多,对于近代女医

则偏向社会史层面的考察,忽略了其作为医者的专业素养。笔者翻检《民国时期总书目》时发现,自1911—1949年间,女医出版、翻译的医学书籍就有苏仪贞《女性卫生常识》(上海中华书局,1923)、马玉书《推拿捷径》(马氏诊所,1930)、赵淑英《妇婴保健》(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1941)等35种,而在《书目》之外,刊载于民国报纸上的女医著作出版信息、发表的医学言论,医学院校女学生的毕业论文等史料也十分丰富。这些书籍和文章除了能反映出近代女医知识结构与医药理论的图景,又因其多涉妇产科、儿科、家庭卫生等内容,其中蕴含的女性身体观、疾病观与家庭医疗照护问题亦值得深入探索。

(四) 报刊等史料的发掘和利用

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具有丰富的史料学意义。仅以《申报》为例,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新闻纸,据笔者统计,其记载的女医人数达600余人,可分为传统女中医、中国女西医与外国女医三类。刊载内容涵盖了女医医学言论、出版著述、出诊广告、患者来信、留学经历、征聘启事、女医学校招生、专门女子医院、社团演讲、法律诉讼、卫生局政令、公益募捐、婚姻问题、诘告等,个别女医有照片留存。尽管医史学界近年来已对晚清民国报刊资料有所重视,但在性别医疗领域除关注到《中国女医》外,还未见其他系统性研究。另外,许多生于晚清民国的女医仍然在世,她们的口述史料值得珍视^①,充分利用报刊的媒介作用,结合口述史,从中窥测近代医疗场域的风云变幻、新旧文化的碰撞与激荡、性别观念的演变,亦能给当今医疗社会文化走向提供启发。

参考文献

- [1] 季寅.女医志[J].中医世界,1929,1(4):52.
- [2] 秦伯未.女医志[J].中医世界,1931,3(16):59-62.
- [3] 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4辑第2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22.
- [4] 谢瑜.中国女医考[J].光华医药杂志,1934,1(6):56-57.
- [5] 王慧芳,楼绍来.中国古代女医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28(3):37-39.
- [6] 刘海波,高畅.我国古代女医师[J].中华医史杂志,1984,14(2).
- [7] 贝润浦.我国古代的女医生[J].科学生活,1984(2):28.
- [8] 李志生.中国古代女性医护者的被边缘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8-94,159.
- [9] 万四妹,刘伯山,陆翔.明清时期新安女医研究[J].中华医史杂志,2018,48(1):21-24.
- [10] 李贞德.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照顾者[J].台大历史学报,1999,23(6):123-156.
- [11]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213.
- [12] Charlotte F.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13] 梁其姿.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M]//李贞德,梁其姿.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55-374.
- [14] 楼劲.释唐令“女医”条及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8(1):94-114,275.
- [15] 徐艳芹.唐代女医群体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5):76-81.

①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较早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运用,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李小江开展“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妇女口述资料搜集,并出版了《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纳入访谈对象的女性有知识女性、红军女战士、战争中的农村妇女、“慰安妇”中的幸存者、东北抗联女兵等,使长期被传统正史所忽略的妇女声音、妇女形象得以生动呈现。

- [16] 董丽娟. 清代女医群体特征统计研究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7(6): 70-73.
- [17] 徐建云. 我国古代女医的成就及其人员稀少的原由探析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3(1): 17-19.
- [18] 林亭秀, 朱明. 中国古代女医及其成才模式初探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7, 22(4): 241-243.
- [19] 张继, 张宗明. 中国古代女医兴衰之医政文化制度探析 [J].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30(5): 65-66.
- [20] 沙蕾, 雍丽, 龚芳芳. 浅析中国古代女医成才之路 [J]. 中医文献杂志, 2016, 34(1): 33-34.
- [21] 王丽. 中国古代女医的教育 [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7, 19(1): 1-2, 8.
- [22] 张秀传. 《史记》中的汉代女医生考释 [C] // 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成立 30 周年暨第二十次学术交流会议论文集, 成都, 2011: 73-75.
- [23] 杨顺益. 晋代女针灸家鲍姑及鲍姑艾 [J]. 中国针灸, 1989, 9(2): 42-43.
- [24] 盖建民. 唐代女道医胡愔及其道教医学思想 [J]. 中国道教, 1999(1): 22-24.
- [25] 汪剑. 谈允贤《女医杂言》评按译释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26] 郑金生. 明代女医谈允贤及其医案《女医杂言》[J]. 中华医史杂志, 1999, 29(3): 153-156.
- [27] 沙蕾, 龚芳芳, 雍丽. 谈允贤与《女医杂言》[J]. 中医文献杂志, 2015, 33(2): 49-52.
- [28] 王晓绚, 何新芳. 谈允贤《女医杂言》辨治特色探微 [J]. 江苏中医药, 2021, 53(3): 69-71.
- [29] 罗思航. 明代女医谈允贤《女医杂言》研究 [D]. 昆明: 云南中医学院, 2018.
- [30] 张易从, 刘绍能. 明代女医谈允贤治疗脾胃病临证特色 [J]. 吉林中医药, 2021, 41(1): 5-7.
- [31] 王超群. 行医救人: 明代职业女医谈允贤研究 [J].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5(0): 98-113.
- [32] 王林云, 段晓华, 刘珊, 等. 浅论曾懿《古欢室医书三种》[J]. 中医文献杂志, 2017, 35(3): 5-8.
- [33] 林振坤, 宋文集. 清代吴中女医顾德华考略 [J]. 中华医史杂志, 2016, 46(5): 272-278.
- [34] 高世瑜. 妇女史研究的瓶颈: 关于史料鉴别问题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1, 23(4): 87-91.
- [35] 胡适.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 [M] // 胡适文存 (三).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533-534.
- [36] 杨彬彬. 由曾懿 (1852—1927) 的个案看晚清“疾病的隐喻”与才女身份 [J].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2008(16): 1-28.
- [37] 梁启超. 倡设女学堂启 [M] //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19.
- [38] 论文明先于女子 [J]. 东方杂志, 1907, 4(10): 194.
- [39] 程为坤. 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97-109.
- [40] 叶汉明. 主体的追寻: 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 [M]. 香港: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1999.
- [41] 陈永森. 告别臣民的尝试: 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42] 蔡博方. 报刊现代性与公民身份: 以申报为例的反思 [J].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6, 6(2): 141-172.
- [43] 陈稳根, 张如青. 近代上海女中医研究概况 [J]. 中医文献杂志, 2016, 34(3): 66-68.
- [44] 杨彬彬. 诊间内外: 近代上海女中医 (1925—1949) [D]. 新竹: 台湾清华大学, 2019.
- [45] 黄子天, 李禾. 清末民国初期揭阳女医家孙西台及其《昼星楼医案》[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0(1): 125-128.
- [46] 施康妮. 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 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 [M]. 程文, 涂明华,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47] 纪征瀚, 严季澜, 祖娜. 民国时期女医创办中医药期刊之路 [J]. 中华医史杂志, 2014, 44(2): 90-96.
- [48] 章原. 民国女医的性别焦虑与身份认同: 以民国女医刊物为中心的分析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7(1): 23-29.
- [49] 马祥, 张丰聪, 韩雅丽, 等. 中国第一种女中医杂志:《中国女医》[C] // 整理、传承、发展 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新思路: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3: 226-229.
- [50] 马祥, 王振国. 《光华医药杂志》“女医专号”特点评述 [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3, 8(5): 436-437.
- [51] 马祥. 民国中医药期刊《中国女医》研究 [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4.
- [52] 赵婧. 医学、职业与性别: 近代女子习医论再探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6): 56-67.
- [53] 赵俐. 清末民初中国女西医研究 (1879—1919)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 [54] 赵耸婷,韩大全.清末民初女子西医教育及女医职业化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5(6):15-18.
- [55] 梁其姿.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56] 龚鸣.广东近现代女性医学从业者对女界启蒙之影响(1879—1931):基于报刊的视角[D].广州:暨南大学,2019.
- [57] 朱梅光.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3):157-163.
- [58] 赵婧.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 [59] 顾佳佳,吴树文.从兴起到复员:近代广州助产学校的演变[J].岭南文史,2015(2):22-26.
- [60] 章梅芳,李戈.民国时期北京产科接生群体的规训与形象建构(1912—1937)[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5):55-61.
- [61] 王庆林,夏坤.晚清教会医校与女医人才的培养:以广州为中心[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S1):106-109.
- [62] 夏坤,赵静.晚清广州女医群体[J].中华医史杂志,2006,36(1):46-51.
- [63] 徐炳三.女信徒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以福州基督教女信徒为研究中心(1857—1949)[M]//陶飞亚.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64] Duffin L. Doctors wanted: No women need apply[J]. *Women 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78,1(3):111-114.
- [65] Drachman V G. *Hospital with a Heart: Women Doctors and the Paradox of Separatism at the New England Hospital, 1862-1969*[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66] Rebecca J. A Women's Calling: Women's Medical Practice in New England, 1650-1750[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6.
- [67] 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2015(3):113-125.

(本文编辑 常馨月)